

# 岭南腰坑葬及其族属研究

洪德善 (桂林博物馆)

**摘要：**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岭南地区腰坑葬俗经历了由出现到兴盛再到消失的过程。本文通过对岭南腰坑葬的分布区域、基本特征、典型器物等的研究，认为腰坑葬俗在岭南地区的盛行期在秦到西汉初期。盛行的主要原因是汉、越两种文化的冲突过程中，岭南越文化的凸显。腰坑葬的族属为西瓯，并认为南越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族称。

**关键词：**岭南；腰坑；分布；盛行时代及原因；族属

**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4-0063-11

广东与广西历史上合称岭南，又称岭表、岭外。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统称南岭，横亘于两广与江西、湖南之间，是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两广南临浩瀚的南海，西接云贵高原，东连闽西南山地，地势北高南低，地形复杂，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境内河流众多，西江、北江、东江汇合后称为珠江，是境内最主要的河流，绝大部分属于珠江水系。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岭南土著文化的面貌已日渐清晰，但它们属于历史上哪些民族所创造，因史载不详，古时就已讼争难决，今人亦无定论。本文拟从岭南腰坑葬俗入手，探寻战国秦汉时期岭南部分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

## 一、腰坑葬的分布

在问题展开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给腰坑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因为正如杨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早年的考古工作中，这种奇特的丧葬习俗并没有引起部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因而对“腰坑”这种现象的定名也不同，甚至于根本没有采集这方面的信息<sup>[1]</sup>。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腰坑的解释为：“(商代)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

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sup>[2]</sup>。但从目前所出土的考古材料来看，无论是其形制、坑的数量还是内置何物皆因时代或地域不同而各异，这一定义已不够准确全面了。参考杨华先生的论著，我们这样定义：腰坑的埋葬方法是在墓坑底部再挖一个或数个坑，坑内有的置瓮棺，有的殉人，有的殉狗等动物，有的放置一些随葬品及其它物品。

根据这一定义和本人所能够掌握的资料，目前岭南地区所见有腰坑的墓葬已超过160座，这其中大部分在墓葬发掘时就已经认识和注意到了这种特殊的丧葬习俗，但也有小部分在墓葬发掘时并没有意识到墓底的坑属腰坑，如四会鸟旦山战国墓发掘报告提到在墓坑底部挖有一长方形小坑掩埋陶罐<sup>[3]</sup>；广东博罗横岭山有11座墓底有“底坑”，2座有玉石类随葬品，其它未见器物<sup>[4]</sup>；广西岑溪糯垌胜塘顶有3座墓墓底有一条“腰沟”，内置陶罐4个或2个，另1座有“3个类似腰坑状的坑”，其中一个内置1件陶罐<sup>[5]</sup>。现在看来，这些都可算作腰坑。岭南腰坑葬的具体分布地点及其简略情况见图一及表一：

从图一和表一，我们可以看到岭南腰坑分布的地域范围：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也是岭南腰坑墓最东的地点是在博罗横岭山；最西的地点是贵港罗泊湾，也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

的带有腰坑的墓葬,且形制复杂,既有殉葬坑,也有器物坑;最南的地点在云开大山、云雾山以北的罗定背夫山;最北的地点临近五岭,在广西境内为桂林灵川马山,在广东境内为乐昌对面山,而以西江及其支流两岸附近地区最为集中。其分布的地理范围大致在五岭以南,青云山、九连山以东,云开大山、云雾山以北,柳江以东,郁江下游至西江流域。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腰坑分布区。

## 二、腰坑葬基本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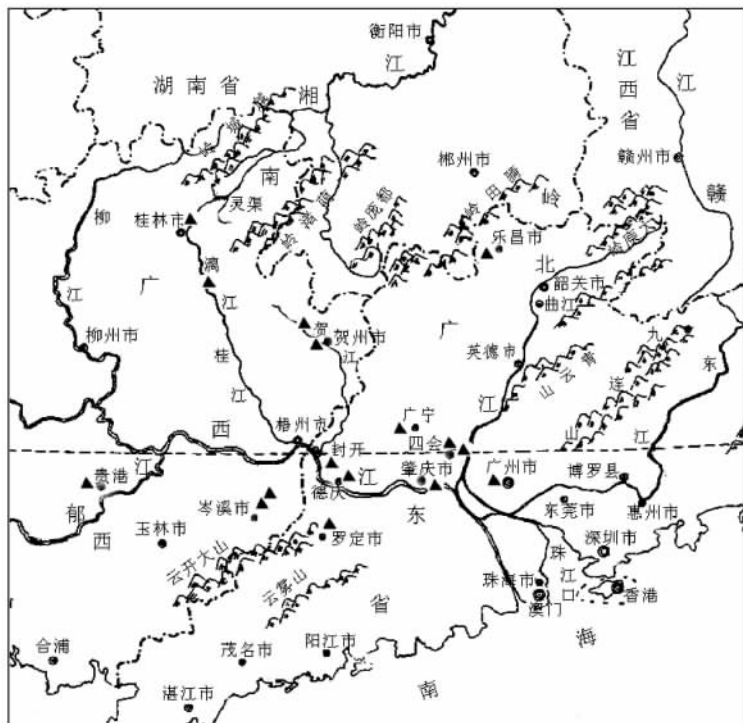
岭南地区的腰坑葬与其它地区的腰坑葬有相似性,但在墓地选择、墓葬形制、腰坑形制及坑内情况、随葬器物等方面又有其自身特点。

(一) 墓地选择。依据考古资料来看,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埋葬死者的场所,形成墓葬比较集中的墓地。而墓地的选择与当时人们的意识和丧葬习俗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岭南地区有腰坑葬俗的墓地有的只是发现单独一座墓葬,但多数地点都是较大规模的墓地。这些墓地大都选择在江河附近的山岗较为平缓的土坡地带,至少一面地

势比较开阔,讲究背山面水。如平乐银山岭墓地,地处都庞岭的南侧,海拔397米,墓地在西北麓,处于海拔170至230米之间,附近冈峦起伏,土岭石山之间也有较开阔的平地,有燕水和同安河自南向北流过<sup>[6]</sup>。又如乐昌对面山墓地,地处一处高约30~40米的低丘陵山地。西北距武江南岸的洲子秦汉城址仅1公里。墓葬主要分布在东西长400、南北宽250米,东西相连的两座山岗的半山腰以上,东部较多,西部较少。墓葬顺山势而建,多数向东或向南,少数向北或向西<sup>[7]</sup>。其它墓地大都属此类情形,不再赘述。至于墓地与居址的关系因目前发掘的居址较少而无法展开系统的研究。

(二) 墓葬形制。从现在掌握的考古材料,战国秦汉时期,岭南的墓葬类别主要流行土坑墓、砖室墓,还有一些地区在一段时期内流行石室墓。砖室墓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岭南地区一般在东汉才流行起来,西汉后期都还很少见到。石室墓只在东汉后期才出现,地域性特点很强。大体上来看,岭南地区腰坑墓的时代从春秋到两汉时期,只见于土坑墓,其余类别的墓如砖室墓、石室墓中都未曾见有。在此,我们将腰坑葬分为广西和广东两个区域来探讨其墓葬形制。

广西范围内:平乐银山岭共发掘战国(发掘报告定为战国的110座墓的时代目前有争议,先依此说,下文再做讨论)到东汉的墓葬155座。其中战国墓110座,西汉前期13座,西汉后期20座,东汉前期12座,都为竖穴土坑墓。其中99座有腰坑,从战国到西汉后期都有出现,东汉以后消失;6座用卵石铺底;25座有二层台;13座既有二层台又用卵石铺底;1座有壁龛;2座有器物坑;23座有墓道<sup>[8]</sup>。钟山张屋共发掘东汉时期墓葬23座。竖穴土坑墓21座,石室墓2座,不见砖室墓。土坑墓中4座有腰坑,9座有墓道,1座墓底铺一层木炭<sup>[9]</sup>。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共发掘墓葬9座,4座土坑墓,5座砖室墓,4座土坑墓都有腰坑,但形



图一 岭南腰坑分布示意图 (图中黑色三角表示腰坑分布地点)

表一

地点	墓葬总数	腰坑墓数量	腰坑形状	内置物品	报告推断时代	资料来源
广西平乐银山岭	155	99	方形、长方形、圆形等	瓮、盒、罐、三足盒、甗、杯、釜	战国晚期到西汉后期	《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广西贵港罗泊湾	2	2	长方形	殉人7，坑内随葬品丰富	西汉初期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
广西灵川马山	7	6	圆形	罐、甗	战国到西汉	《广西考古文集》228页
广西贺州高屋背岭	2	1	圆形	瓮	战国中晚期	《广西考古文集》259页
广西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	9	4	3墓沟状，1墓有3坑	罐	东汉早期	《广西考古文集第二集》285页。
广西岑溪花果山	14	13	圆形，其中1墓有2个	瓮、罐、碗、钵	战国晚期	《广西考古文集》213页
广西钟山县张屋	23	4	圆形	瓮	东汉前中期	《考古》，1998年第11期
广州市（西村石头岗、建设新村）		5	圆形	瓮	西汉初期	《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广东封开利羊墩	41	29	圆形、大方形、圆角方形	瓮、罐	战国到西汉初	《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广东广宁县铜鼓岗	22	3	M16方形腰坑，其余不明	瓮	战国晚期	《考古学辑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广东广宁龙嘴岗	9	1	圆形	无	战国晚期	《考古》1998年第7期
广东乐昌市对面山	191	2	1圆形，1不明	1墓为瓮，另1不清	春秋	《考古》2000年6期
广东四会鸟旦山	1	1	形方	陶罐	战国早期	《考古》1975年2期
广东德庆	1	1	近圆形	陶匏壶	战国	《文物》1973年9期
广东肇庆北岭松山	1	1	圆形	不明	战国晚期	《文物》1974年11期
广东罗定背夫山	1	1	圆形	瓮	战国早期	《考古》1986年3期
广东四会高地园	2	1	方形	匏壶	战国早中期	《考古》1985年4期
博罗横岭山	302	11	方形、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	砺石、玉管	西周早期到春秋	《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制、大小等有异。这4座墓都有斜坡墓道，墓道底部与墓室底部之间有一级或几级台阶，平面呈“凸”字形，墓底都铺有碎石，都有生土二层台<sup>[10]</sup>。此墓地既有带腰坑的土坑墓又有汉文化的砖室墓在同一墓地内共存，是难得一见的材料。且时间上又有早晚关系，发掘简报认为“应是两个家族墓地”。2001年，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在贺州高屋背岭西侧进行调查勘探，发现墓葬129座，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埋藏较深，多在3米以上。绝大多数无墓道，基本为东西向，密集分布于山岗东侧向阳地带，排列整齐，似为某一族群墓地，此地墓葬估计超过300座。试掘2座，都为无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1座有二层台，另1座有三层台、卵石铺底、圆形腰坑<sup>[11]</sup>。

在广东境内：乐昌对面山发掘自周秦至两汉墓葬191座，属春秋时期的6座，仅有2座有腰坑的墓葬都出在此期，战国墓17座，秦至西汉初期53座，西汉后期77座，东汉前期25座，东汉后期13座。这批墓葬除1座遭破坏形制不明外，其余190座都为竖穴土坑墓，9座有二层台，有的用卵石铺底，44座有墓道<sup>[12]</sup>。封开利羊墩，清理58座墓葬，战国30座，西汉早期11座，西汉晚期1座，东汉墓1座，都为土坑墓。其中29座有腰坑，是目前为止，除平乐银山岭以外，所见腰坑最多的墓地<sup>[13]</sup>。广州西村石头岗，《广州汉墓》共收录1953至1960年在广州市郊清理发掘的409座两汉墓葬的资料。腰坑墓5座，4座出自西村石头岗，1座出自建设大马路建设新村。西村石头岗共出土西汉早期至东



汉前期的墓葬 23 座,除 1 座为砖室墓,1 座形制不明外,余皆为土坑墓<sup>[14]</sup>。博罗横岭山,共发掘商周时期墓葬 302 座,墓向大致与山岗等高线的切线一致,顺着山坡分布,与南朝以后墓葬头向高处,脚向低处有别。其中有底坑(腰坑)的 11 座,有二层台的 18 座,有壁龛的 2 座。有腰坑的墓葬时代为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而 17 座商晚期的墓都无腰坑。而且此墓地碎物葬习俗较为明显,一些陶瓷器特别是体形较大的瓮、罐、簋等葬入时多数被有意打碎,打碎的陶瓷器有集中放置的,也有散乱埋入的<sup>[15]</sup>。

由以上材料可以发现当地民族流行土葬,都为竖穴土坑墓,似有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特点,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一直延续本民族的丧葬习俗。

(三) 腰坑形制及坑内情况。岭南地区所见腰坑的形制与中原地区相比是比较多样的,有圆形,(长)方形、圆角方形、椭圆形、菱形、不规则形等几种。以圆形和(长)方形居多,一般规模都不大,以能放置 1 件陶器为适,长宽或直径不超过 1 米。但也有比较特殊的,如广西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东汉墓的长方形腰坑长度都超过 2 米。再有就是罗泊湾 2 座汉墓的腰坑形制更为特殊。M1 的 7 个殉人腰坑长在 3 米左右,2 个器物坑长接近 2 米。M2 的 1 个殉人腰坑却要小得多,长只有 1.42 米。类似罗泊湾 M1 有多个腰坑的现象还见于广西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 M7,墓底中部有三个腰坑,口径 0.24—0.38 米;岑溪花果山 M5 墓底挖两个圆形腰坑,博罗横岭山 M047 墓底有 3 个不规则形腰坑。

岭南地区腰坑内以放置 1 件陶器为主,与中原地区普遍殉人、埋狗习俗不同。器形有瓮、罐、碗、钵、盒、三足盒、杯、甬、釜、匏壶等。但也有几种例外:一是空无一物,如博罗横岭山大多如此;一是放置多件陶器,广西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 M2、M3 都内置 4 件、M5 内置 2 件陶罐;一是不见陶器,而见砺石、玉管,分别为博罗横岭山 M213、M238;一是明显是器物坑,内置器物以青铜器为主,如罗泊湾 M1 的 2 个器物坑,内置铜鼓、铜簋等青铜器;最后一种比较极端的,就是坑内殉人,罗泊湾 M1 殉 7 人、M2 殉 1 人。

(四) 随葬器物特征。通过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已基本弄清了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土著文化的一些共同面貌。典型越文化的特征,如印纹陶较多并在陶器上刻划符号,陶器器形多见甬、联罐、盒、三足盒、提簋等;青铜器如盘口撇足的越式鼎以及形式多样的钺、刮刀、铜鼓、羊角钮钟、人首柱形器等。但越文化分布的范围很广,“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不同的支系,有各自相对独特的文化。下面我们着重考察腰坑墓分布区的独特青铜文化。

大量与中原文化风格不同的青铜钺是越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李龙章将岭南的青铜钺分为七个类型。即风字形(A型)、扇形(B型)、双肩铲形(C型)、凸字形(D型)、重肩凸字形(E型)、圆头形(F型)和靴形(G型)。这几种青铜钺又有相对集中的分布区域,在腰坑葬俗区域内,主要出土有 B 型扇形钺、C 型双肩铲形钺和 E 型重肩凸字形钺<sup>[16]</sup>。

人首柱形器也是这一区域的典型器物。岭南地区在平乐银山岭(6件)、恭城秧家(2件)、贺县龙中(3件)、贺州高屋背岭(4件)、象州下那槽(1件)、肇庆松山(4件)、怀集拦马山(4件)、四会高地园(2件)、四会鸟旦山(4件)、罗定南门洞(4件)、罗定背夫山(4件)、清远马头岗(4件)、岑溪凤根山(2件)13个地点共出土人首柱形器 44 件<sup>[17]</sup>,其分布区域与腰坑葬分布区域基本重合,其它地区尚未见到,无疑是这一区域独特的文化现象。蒋廷瑜先生对铜人首柱形器的作用进行了考证,其说可从<sup>[18]</sup>。

盘口鼎也被认为是这一地区典型的器物之一<sup>[19]</sup>。李龙章把此类鼎定为岭南的 D 型鼎,认为是最具岭南特色的越式鼎,并统计岭南共出土 67 件,除 1 件出自宾阳韦坡、1 件出自揭阳面头岭,余 65 件都出自腰坑葬俗分布区域内。就全国范围来看,也仅在湖南衡阳胡家港春秋墓出土 1 件与此型鼎近似<sup>[20]</sup>。

竹叶(柳叶)形刮刀也是这一区域典型的越文化器物之一。有些刮刀如罗定背夫山 1:27、广宁龙嘴岗 M11:6 等饰有“王”字形符号,亦见于罗定背夫山 2 件人首柱形器及四会鸟旦山、德庆落雁山、广宁铜鼓岗等地的青铜矛、青铜钺等器物上,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

由此可见,这一区域内有着较为独特、稳定的丧葬习俗和独特的青铜文化,应是历史上同一个族群活动的范围。

### 三、来源、盛行时代及原因

关于岭南腰坑葬的来源、盛行时代及原因,已有学者论及,在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岭南腰坑的来源。岭南地区所见最早的腰坑是在博罗横岭山,也是目前岭南所见腰坑最东面的地点,出现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的11座墓葬,但这批同一墓地的腰坑形制不统一,坑内情形都与后期的腰坑不同,似显得比较原始而无规律可寻,只有2座腰坑内发现有随葬品:M213出砺石1件、M238出玉管2件。其余9座未见随葬品,不排除与中原商周时期腰坑相似,殉葬动物之类,由于墓地埋藏环境为酸性土壤的氧化环境,腐蚀性强,有机质难以保存,葬具、骨骼未被发现,葬具、葬式都不明<sup>[21]</sup>,如是殉葬动物之类,亦可能腐朽无存。它是否与中原及岭南战国以后的腰坑葬俗有联系因资料太少而无法确定,尚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在此暂不把它纳入我们的讨论。就目前的材料来分析,从腰坑形制、坑内多放置一件陶器的做法,以及岭南越文化与岭北越文化显示有较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岭南腰坑葬俗是由两湖地区南传两广的观点<sup>[22]</sup>是较为可信的。但再往前溯及其源头,认为腰坑葬俗来自殷周则值得商榷。据杨华研究认为,腰坑葬俗最早应起源于南方地区,具体地点在两湖北部及西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腰坑内置一瓮棺,葬具为罐或釜,瓮棺内葬一婴儿或一鱼,最初与某种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尔后对中原华夏民族产生过强烈影响,殷周之时在黄河流域盛行,但其腰坑性质改变,盛行殉人之风、殉狗之俗,春秋战国时期趋向衰落,战国以后,黄河流域腰坑葬俗基本消失。随着殷周势力的扩张,这种中原化的葬俗又曾影响到两湖地区,一些殷周时期的腰坑亦有殉葬动物的<sup>[23]</sup>。但南方地区腰坑葬俗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或更晚都在延续,应为一脉相承,其性质和用途在商周时虽受到过中原的影响,但总体来看,与中原地区仍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岭南地区的腰坑葬俗在腰坑形制、坑内情形与湖南桃江腰

子仑春秋墓<sup>[24]</sup>、资兴旧市战国墓<sup>[25]</sup>中带腰坑的墓葬都比较接近,而与中原腰坑葬俗差别较大,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岭南腰坑葬俗是直接由两湖地区主要是湖南地区传来,而并非殷周之俗渐次南传,与文化传播的滞后性没有关系。

(二) 盛行时代。从以上统计的材料,根据各发掘报告或简报的时代推断,岭南地区腰坑葬最早的到西周早期,最晚到东汉早中期。其盛行的时代有学者认为是在战国中晚期<sup>[26]</sup>。从各发掘报告或简报所推定的时代来看,确实是在这一阶段。但随着考古出土的材料日渐丰富,岭南地区可供参照对比的断代系统逐步建立,对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发表的一批墓葬材料的断代不断有学者提出新的看法。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年代的重新探讨则是岭南先秦至秦汉之际的墓葬年代再探讨的重心之一,因为这是岭南地区公布相对较早、数量较大的一批墓葬材料,资料发表以后又成为岭南地区墓葬断代的重要参照标尺,准确判断它的时代对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代墓葬年代序列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大都认为其时代应在秦到西汉前期<sup>[27]</sup>。综合各家意见,结合大多数墓葬以铁制生产工具为随葬品和历史文献的记载,笔者认为平乐银山岭墓群中原定为战国时代的墓葬应改断在秦至西汉初期是较为符合实际<sup>[28]</sup>。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推后了,以它为参照的墓葬断代怎么处理呢?会不会引发“多米诺”效应?笔者认为尚需谨慎对待,在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再作结论,把所有有关墓葬的时代都往后推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但我们把岭南最集中、数量最多的一批腰坑墓葬的年代弄清以后,腰坑葬俗在岭南的盛行时代也就解决了,那就是秦到西汉初期。

(三) 盛行原因。腰坑葬俗的兴盛与岭南土著越人社会的发展及此种葬俗的性质密切相关,这是颇有见地的<sup>[29]</sup>。此外,弄清了腰坑葬俗盛行的大致时代,为我们解决其盛行原因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因为不管是任何历史事件还是思想意识都无法脱离时代背景的制约和影响。笔者认为,岭南腰坑葬的盛行很有可能是秦平岭南时,中原文化的大规模南下,汉、越文化激烈冲突,越文化在短期内凸显的表现之一。在长期研究中华大一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我们的研究者多强

调文化的融合,而忽视文化的冲突与对抗的研究,这是有失偏颇的。令人欣慰的是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缺失,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如有学者提出秦文化具有容纳性、功利性、外倾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其在推行过程中与区域文化形成过激烈的对抗<sup>[30]</sup>。秦平岭南的军事、政治行动,实际上是秦文化南下岭南,凭借其强势对岭南文化实行强制性文化变迁的过程,也就是人类学家所称的“涵化”过程。土著民族对外来强加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迁移到更边远的地区;另一种是如果在面对强大的外部统治的时候能够依然坚持自己的一些传统,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融合;还有一种对压制性变迁的常见反应是排拒,即变迁过程十分迅速,以至于许多人不能接受这种变迁,其结果会造成排拒、反抗或复兴<sup>[31]</sup>。秦军的大举南下包括其军事、政治和文化行为导致岭南越文化复兴的反涵化斗争兴起,腰坑葬俗盛行很有可能就是岭南越文化排拒、反抗秦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岭南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着较为独特的自然环境:既多丘陵山地、河流纵横,又面临大海。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秦汉以前居住于此的人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每个种族和真正的民族单位,都认为自己优于其它民族,并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秀的……一个人一旦完全习惯于自己故乡的文化,就很难抛弃对它的忠诚。如果出现危机,他就会起而站在自己祖先的文化一边”<sup>[32]</sup>。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史籍记载秦平岭南过程中遭遇西瓯时西瓯族为何奋起反抗、让秦军损失惨重了。也可以理解面对强势文化的压制,腰坑葬俗在岭南流行是越文化复兴的表现了。

#### 四、族属探讨

岭南腰坑葬俗分布区域为古代百越民族的活动区域在学界已成为共识,如前面论及,岭南腰坑葬俗来自于两湖地区,亦即楚地,而楚地的腰坑墓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与岭南腰坑墓相近似,资兴战国墓中的IV类器物组合墓,墓葬形制与银山岭相似,3座有腰坑,陶器组合未形成固定的形式,礼器少,以实用生活用具为主,与另外I、II、III类器物组合墓有明显的差别,应是百越文

化的葬俗,这类墓葬是楚国的越人墓<sup>[33]</sup>。西汉前期的A类墓仍然沿袭这一葬俗,墓葬形制虽已不见腰坑,但都是无墓道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有罐、杯、三足盒、小盒、纺轮、越式鼎等,少见陶礼器,其墓主应是越人的后裔<sup>[34]</sup>。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的第一类器物组合的墓葬54座,5座有腰坑,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第二类器物组合的汉文化墓葬有明显的差异,而与平乐银山岭、资兴西汉A类相似。这种差异“应属于民族风习在葬仪上的反映,这类墓的墓主应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即南越人”<sup>[35]</sup>。自东周以来,“湘南、桂东、粤西一带的发现看,这种带腰坑的狭长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放置缺乏一定规律的特点,应是这一区域古越族的一种葬俗”<sup>[36]</sup>。但在岭南腰坑葬俗分布区域,其具体族属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论及岭南腰坑分布区的族属时,目前学界有两种主要倾向。一是认为非单一族属,多数学者分为西瓯与南越两支。罗香林先生认为今广西柳江以东,湖南衡阳西南,下至今苍梧封川,北达今黔桂界上为西瓯居地,与骆越同为百越不同的分支。南越为扬越之一部分,以其地为扬越南部,故称南越,南越曾建立大国,即秦汉之际的南越国<sup>[37]</sup>。蒙文通先生认为西瓯、骆越为二族,汉代郁林、苍梧、合浦三郡皆西瓯之地,苍梧为西瓯的核心区,赵佗在此建苍梧国,汉平南越因之置苍梧郡,苍梧即古之西瓯。并认为西瓯与南越毗邻,习俗略同,但语言不同,似为二族<sup>[38]</sup>。当代民族史著作多从此说<sup>[39]</sup>。另一种倾向认为是单一族属。一说为“苍梧”。陆明天认为,西瓯、骆越系同族异称,分布于桂南、粤南及交趾地区。桂东北、粤中、粤北为同一文化区,其族名为苍梧,南越不是族称,而是一个政治实体名称<sup>[40]</sup>。一说为“西越”。王和平认为与东瓯相对举,称西越较贴切<sup>[41]</sup>。

也有不少学者专门探讨过桂东北地区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民族,除西瓯说较为流行外,也有学者提出骆越说,如覃彩銮认为桂东北等地及桂西南等地的文化都是骆越人创造<sup>[42]</sup>。另有瓯骆说,如覃圣敏认为,在先秦时期,瓯与骆原是两支不同的越人,西瓯在北,骆越在南。在秦朝时,两支越人为了共同抵抗秦军而结成联盟,因而有瓯



骆之称<sup>[43]</sup>。对于西瓯与骆越到底是同族异称,还是不同的二族,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不展开论述,同时也感到无需再作讨论,因为蒋廷瑜先生对这个问题已做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sup>[44]</sup>。

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民族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某一古代民族与一定的考古学文化若文化特点上具有共同性、地域分布上相同、历史年代一致此三方面吻合的情况下,认定这种考古学文化即此民族之遗存,是可以成立的<sup>[45]</sup>。对民族最容易和最适用的分类法就是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进行分类<sup>[46]</sup>。在同一文化区域内,只可能有一个主要民族。本人倾向于岭南腰坑分布区为单一民族说,但到底是哪一支古代民族呢?

不是苍梧。对苍梧族一说,有学者根据史籍已对其做了充分的辩驳<sup>[47]</sup>,在此不做重复,而是据新的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做一些补充。2002年,在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秦代简牍36000余枚,共10多万字<sup>[48]</sup>。对这批秦简的研究已取得不少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苍梧郡的始设朝代及其地望。王焕林研究后认为,苍梧郡始建于秦是没有疑问的,其建置最迟不会晚于始皇廿七年(公元前220年)。并且秦汉两朝的苍梧郡舆地差异极大。汉苍梧郡辖地大多在今广西、广东境内,秦苍梧郡属县多在今湖南境内,郡治在零陵即今湖南永州。因而所谓的楚“南平百越”、“有洞庭、苍梧”其地实际上大都未逾五岭<sup>[49]</sup>。那么三代时的“仓吾”更是相去甚远了,《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其所涉及的山名、地名应与广西境内之苍梧无直接关系,所谓郡以山名、族以山名,桂东、粤中、粤北为先秦时期苍梧族地是值得商榷的。

西越之称不准确。王和平根据郭璞《山海经注》曰:“郁林郡为西瓯”和《太平御览》卷171引《郡国志》作“西越”,认为西瓯是越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越”与“东越”相对而言,称“西越”比称“西瓯”更贴切<sup>[50]</sup>。仅根据一处文献记载将其定名为西越,证据显得不足,西越一称似为泛称,不能确指,谈不上贴切。而同时代的史籍和其后的史籍当中多见有“西瓯”一称,并有相对确定的地理分布区域的记载,应更为准确。

不是南越。“南越”非族称<sup>[51]</sup>,此说甚是。考“南越”一称,最早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尉佗”、“自立为南越武王”,由此可见,“南越”从一开始就是做为一个政治概念出现的。因而多数学者认为南越既是国名,又是族称<sup>[52]</sup>。国以族名,近现代民族国家常见,古代历史上也不乏其例。但南越国是南下的中原人建立的,而不是少数民族自己建立的政权,其国名是越化的,而其政权的实质是汉式的。不加分析的将国名与族名等同起来,由此称其境内的土著民族为南越,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民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实体;同一民族的人说共同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传统”<sup>[53]</sup>。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腰坑葬俗分布有相对固定的区域,生活着有共同文化的人们群体,那么他们具备了为同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在讨论其族称时,我们不能将其割裂开来。这个民族不称做南越,而是西瓯。

为何是西瓯呢?有确凿充分的历史文献可考。自汉以后,历代文献多有记载。在此我们重点考察两汉时期史籍文献的记载,因所记当代或前一朝之事,应是较为准确可靠的。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载:“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sup>[54]</sup>。东汉班固在《汉书》中亦有类似记载:“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裸,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sup>[55]</sup>。蒋廷瑜先生据此认为,其意为南越之西有西瓯,方位明确。西汉南越国是以番禺(今广州)为都城,以秦之南海郡为基地,并囊括了桂林郡和象郡,占有今广西、广东和越南北部,所谓南越之西,应该是在今广西境内<sup>[56]</sup>。这样理解,初看是没有问题的,但细细研读起来,还是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南越之西,以“南越”做为原点,依据何在呢?上面所引两句话中都没有明确提到,那完全就是后人理解,这理解就可能有误。另外,“南越”到底做何解呢?国名还是族名?模糊不清,隐约让我们感到是“南海郡”。下面谈谈我对《史记》和《汉书》中的这两句话的理解,如有不妥之处,望方家批评指正。这两句话的核心是“称王”,是赵佗面见汉使陆贾时担心大汉朝因其私自称王

兴师问罪所做的辩解。《史记》中的那句话谈及南方百越几个支系分布方位时,是有原点的,那就是“蛮夷”,其意为“蛮夷”居中,其东的闽越称王了,其西的瓯骆裸国也称王了。老臣也就妄窃帝号,聊以自娱。《汉书》中的那一句话与《史记》中的话表达上略有不同,没有设定原点,但所表达的意思却大致相同的。其意大致为:南方的蛮夷当中,西面有西瓯,东面有闽越,西北面有长沙,都称王了,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史记》中一句说东西方向有“蛮夷”、“闽越”、“瓯骆”三个族称,而《汉书》中一句说东西方向只有“西瓯”、“闽越”二个族称,为何还说其一大体一致呢。那就要弄清“蛮夷”是什么意思。

“蛮夷”何指呢?两句话中的“蛮夷”所指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是指赵佗之辈。何以见得呢?西汉孝文帝时,遣陆贾使南越,陆贾至南越,王(赵佗)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sup>[57]</sup>,很明显此“蛮夷”乃赵佗谦卑自称,此其一;其二,赵佗本“中国人”,在百越之地建立统治,入乡随俗,“弃冠带”“魃结箕踞”是其统治的策略,自称“蛮夷”也就可以理解。后者是指南方未开化的民族,西北长沙其“半蛮夷”,“半”者指开化程度而言,其意为长沙地是“半蛮夷、半开化”地区。弄清了这两句话的语义,岭南民族的分布也就比较清楚了。“蛮夷”居中,此蛮夷即为赵佗之辈,其所居之地就应该是番禺(今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其西的西瓯就应该是在广州以西,那就不仅是今广西境内了。同时南方蛮夷的几支大致分布方位说得很清楚了:南方西部是西瓯(瓯骆),东部是闽越,中部“蛮夷”所居实际上就是赵佗之辈,并非为南越族。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南越做为族称是不存在的。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赵佗自称“蛮夷”有谦卑之意。但通读其书,其间亦蕴含咄咄逼人之气势:南方蛮夷都称王了,我也是“蛮夷”,称个王聊以自娱,为自己开脱责任;其众半裸之西瓯、其众数千人之闽越、半蛮夷之长沙都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因为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狂傲之气溢于言表。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说腰坑分布区都属西瓯

族,秦平岭南的50万大军兵分五路:一军塞谭成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sup>[58]</sup>的前三路军都是进攻西瓯族的地区,为何前两路军遭遇西瓯的顽强抵抗而第三路军进取番禺可谓神速呢?对于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一方面第三路军占有地利,逾岭顺北江而下可直抵番禺;而进攻今广西境内越人的秦军却要逆湘水而上,还要经陆路逾岭方可抵达离水,粮草补给困难,军队进展受阻。而更重要的是桂东是西瓯的核心分布区,抵御力量强大。番禺及其附近地区已是西瓯的边缘地带,其地非西瓯中心,其抵抗力量自然不能跟中心地区相提并论。

以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南越国以前并非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只是在秦平岭南和南越国建立以后随着大批中原人的迁人才逐渐繁荣起来。据《广州汉墓》<sup>[59]</sup>的分析统计,属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为182座,其中属越文化的只有54座,不到三分之一,可以推测此地人口以中原南下的汉人为主。到了武帝平南越以后,在岭南重划郡县,南海郡沿袭下来,其郡内户口数都还是相对较少的(见表二),可以推断其地在先秦时期尚不是岭南越人的活动中心区域。从当时户口数量来判断,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南越国以前一个是苍梧地区,另一个是交趾地区。这可能与当时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地理环境不太适合生产生活有关。有研究显示,至今6000年左右,海平面上升至现今位置或略高,在珠江三角洲海水入侵北达广花平原,东至东莞,华南沿海地区,除三角洲丘陵山地以外,大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此时珠江三角洲平原为约20米水深的浅海环境,加之珠江水系的河流向海洋注入丰富的营养物质,使海生生物格外繁荣,贝类和鱼类等资源丰富,从而环珠江口新石器文化逐渐兴起。但距今3000年左右时,新石器文化急剧衰落,华南沿海地区气候环境的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距今4000~3000年左右,气候变凉,季节性变化增大,暴雨增加等使珠江三角洲由浅海环境急速过渡到河流堆积为主的沉积环境,以捕捞海洋水产为生的先民已无法在这一区域生活下去<sup>[61]</sup>。由此看来,在距今3000~2000年之间,珠江三角洲曾有一段时间仍不太适于生产和生



活。在河流冲积平原稳定下来以后,肥沃的冲积平原有利于水稻种植,秦汉时期水稻种植迅速扩大,以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才又繁荣起来。博罗横岭山墓地的墓葬时代从商周之际到春

表二:岭南7郡户口统计表<sup>[60]</sup>

郡名	户数	口数
南海	19613	94253
郁林	12415	71162
苍梧	24379	146160
交趾	92440	746237
合浦	15398	78980
九真	35743	166013
日南	15460	69484

秋时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随葬品丰富的墓葬的墓葬多发现在西江与北江汇合处、珠江三角洲的西北部,而横岭山墓地确没有此期的延续,报告者推测这或许暗示着文化中心的西移<sup>[62]</sup>,联系起来看是有道理的。西瓯的活动中心在西江及其支流漓江(桂江)、贺江流域,今广州一带已是其活动的东部边缘地带,并非所谓的南越族。因而我们相信,所谓的南越族就是西瓯族的一部分。南越一称只是做为国名,它的提出是赵佗策略上的考虑。

##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岭南地区腰坑分布区域主要是历史上的西瓯族活动的范围,南越并非确指的族称,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当然在这一地域内部,文化面貌也并不完全同一,细微的差异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其文化的同一性占主导地位,不足以影响到我们把它们视为同一古代民族。再则,岭南地区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和交往始终是没有也没办法割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都会接受一些周边的文化,而周边的文化亦是多样性的。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楚国的开疆拓土,秦汉帝国统一岭南的军事、政治行动和措施而导致的人口迁移、文化渗透等方面的因素,整个西瓯越范围内的文化面貌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此外,关于西瓯的族源,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主要的来源是当地世居的土著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但有些观点的提出,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思路。如梁钊韬先生在《西瓯族源初探》<sup>[63]</sup>一文中,提出西瓯族是由浙江的东瓯迁徙而来,其民族成分至为复杂。此说提出后,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不

足为信<sup>[64]</sup>。但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发表,西瓯与东瓯的联系似有踪迹可寻。在浙江温岭市大溪塘山2003年发掘的温塘M2和2006年发掘的温塘M1都是东瓯国墓葬<sup>[65]</sup>。M1、M2各出土匏壶5件和1件,此种器物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宁绍和杭嘉湖地区稀有出土,但在同时期的福建、两广地区常见。另外两座墓出土的3件陶甗亦是两广常见的器物,似可看到西瓯与东瓯有较密切的关系。但在东瓯建国之前,瓯(欧、沔、区)人的文化面貌如何,尚缺乏必要的考古学材料来加以认识。再有,就是西瓯的西界问题,从目前的考古学材料来看到的,大致以柳江为界,而我们在上文也提到过,蒋廷瑜先生曾对铜人首柱形器的用途做过考证,他的认识却是发端于广西北部、靠近贵州的南丹白裤瑶的民族学材料,历史上这一带是否也是西瓯族的分布范围,因桂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材料甚少,也是一个需长期探索的问题。

注释:

[1] 杨华:《长江三峡地区古代腰坑族属的考古研究》,《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66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东汉墓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第二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东汉墓发掘》,《广西考古文集第二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贺州市高屋背岭古墓群勘探与试掘》,《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13] 杨式挺：《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1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15]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16]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

[17] a、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b、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

c、贺县博物馆：《广西贺县龙中岩洞葬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d、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贺州市高屋背岭古墓群勘探与试掘》，《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e、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9期。

f、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肇庆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d、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第4期。

h、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乌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i、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第1期。

j、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k、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考古》1963年第2期。l、刘统载：《岑溪县凤根山战国墓》，《中国考古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

[18] 蒋廷瑜：《铜柱形器用途推考》，《考古》1987年第8期。

[19] 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百越研究（第一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20]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

[2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22] 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23] 杨华：《中国南方先秦时期腰坑墓葬俗文化的考古研究——兼论南方腰坑墓葬俗文化对北方腰坑墓葬俗文化的影响》，《湖南考古》，岳麓书社2002年。

[24] 益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桃江腰子仑春秋墓》，《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

[25]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26] 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27] 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黄展岳：《两广汉墓的发掘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黄展岳、麦英豪：《从南越墓看南越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容达贤：《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的时代与墓主》，《百越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28] 洪德善：《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探讨》，《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五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29] 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30] 谢子平：《秦汉之际区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人文杂志》2002年第1期。

[31] [美]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马广海著：《文化人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

[32] [美]克拉克·威斯勒著，钱岗南、傅志强译：《人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

[33]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34] 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

[3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36] 杨式挺：《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37] 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南方民族史论文集（一）》1982年。

[38] 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

[39] 蒋炳钊、吴绵吉、辛士成：《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民族出版社2007年；田继周：《秦汉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40] 陆明天：《秦汉前后岭南百越主要支系的分布及族称》，《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41] 王和平：《从先秦两汉的考古学文化探索古代岭南人的族系》，《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42] 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43] 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百越研究（第一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44] 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百越研究（第一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45] 王和平：《从先秦两汉的考古学文化探索古代岭南人的族系》，《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46] [美]克拉克·威斯勒著，钱岗南、傅志强译：《人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

[47] 邱明：《西瓯骆越族称辨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 汉代墓室壁画形态中的“频闪效应”

王 伟 (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摘要：相似性的连续排列是汉代墓室壁画形态结构组合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知觉式样使观者在视觉心理上产生了“频闪效应”，进而，使得本来静止的画面富有动感。

关键词：汉代墓室壁画；形态；结构；频闪效应

中图分类号：K87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3-0073-03

汉代艺术形态中的“运动”特征是有目共睹的，宗白华在论及汉代艺术时说：“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一种飞舞的状态”<sup>[1]</sup>。高居翰在《中国绘画史》中也提到：“汉代艺术的表现目的似乎就是表现这种动势”<sup>[2]</sup>。李泽厚将运动、力量、气势归结为汉代艺术的本质<sup>[3]</sup>。然而，对这种动感产生的原因却很少有人做进一步的探讨。

毫无疑问，绘画本身并不存在物理运动，在绘画中所见到的“动”也不是由物理力驱动的运动。

那么，汉代的绘画艺术怎么会彰显出这种动感的共性呢？笔者认为：这种动感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从绘画作品的形态结构上讲，主要有：线性的结构、结构的倾斜性、对常态的偏离等，本文所述的绘画形态的结构组合呈相似性连续排列，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灯箱、灯泡，还是电影、电视，看上去似乎都在运动。其实，它们并没有发生任何的物理运动，而是相似形象的连续变化使人明显知觉到的运动，这种一连串

1995年第4期。

[4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秦汉城址及秦代简牍》，《考古》2003年第7期。

[49] 王焕林：《里耶秦简释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50] 王和平：《从先秦两汉的考古学文化探索古代岭南人的族系》，《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51] 陆天明：《秦汉前后岭南百越主要支系的分布及其族称》，《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52] 蒋炳钊、吴绵吉、辛士成：《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民族出版社2007年。

[53] 转引自王希恩：《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主要渊源》，《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54]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

[55] 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2007年。

[56] 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百越研究（第一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57] 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

[58] 王洁红译注：《淮南子》，广州出版社2004年。

[5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60] 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2007年。

[61] 郑卓、邓韞、张华、余荣春、陈炽新：《华南沿海热带——亚热带地区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第四纪研究》，2007年第4期。

[6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63] 见《学术月刊》1978年第1期。

[64] 李延凌：《西瓯族源流问题的探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重建三十周年论文选集》1986年。

[6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温岭塘山发现西汉东瓯国墓葬》，《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温岭市塘山西汉东瓯贵族墓》，《考古》2007年第11期。